



江苏发展研究文库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 以江苏为例

孟召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发展研究文库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 以江苏为例

孟召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以江苏为例/孟召宜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2

(江苏发展研究文库)

ISBN 978-7-214-06139-3

I. 文… II. 孟… III. ①文化事业—发展—研究—江苏省②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江苏省 IV. G127.53 F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302 号

出 版 人 刘健屏

出版统筹 王建润 戴亦梁

装帧设计 芮 玲

书 名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以江苏为例

著 者 孟召宜

责任编辑 杨建平 于 帆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39-3

定 价 2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以来,有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论争的一个热点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相继迅速崛起,有关儒家文化、“亚洲价值观”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和后工业社会之间的互动,使西方社会呈现出了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新趋势,当代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与经济内在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新特征。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文化经济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便迅速成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讨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研究带来了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演化转向(Evolutionary Turn)等诸多研究方向的转折,不仅促进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研究内容体系和研究视角的变革,而且为新时期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思维灵感。新世纪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维转向”之后,伴随着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不断深入,不同学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在实证研究与理论争论中,“制度转向”强调,如果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塑造的多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给以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经济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充分的理解。“文化转向”强调,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文化与经济不仅仅互为外在表现和相互内在嵌入,更通过人们和组织内在的心智与行动能力(Action Capacities)而有机联结。“关系转向”强调,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乃是各种行为者(Actor)在“社会—空间”关系建构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转向”强调,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技术—制度时空协同演化的过程,既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甚至锁定(Lock-In),也存在着新路径的创造。在这诸多的转向之中,如果说制度转向、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突出的是研究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转变,那么文化转向不仅突出了研究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转变,而且更突出了研究范式在本体论方面的转变。

然而,将文化纳入规范的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学者们虽然普遍承认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有巨大作用,但由于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难以捉摸、难以刻度、难以操作的概念,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把文化排斥在规范的理论分析之外。新近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的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的兴起,代表了学术界将文化纳入其理论建构的一种新的努力。事实上,文化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既表现为抽象的价值观念、信仰等心理层次,也表现为具体的人际交往模式、行为和稳定的习俗、道德。同时,文化的影响层次也多元立体,既通过涵化,影响人们内在的心智模式;也通过制约和指导,影响人际关系模式,并通过非正式约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此,在文化经济分析中,不仅要关注“关系”和“网络”,而且要关注关系两端行为者的内在“心智”;不仅要注重文化的稳定性,而且要注重文化的变迁性。这意味着,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如何在进一步推动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的基础上实现多维转向的创造性整合已为理论创新的一个攻坚堡垒。

中国的区域发展及地理不平衡性是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经济地理学进行理论诠释和案例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尽管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但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为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更加复杂、立体的情景。江苏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区域发展及其地理不平衡性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是文化与经济多元互动、协同演化的一个生动体现。本书的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其在广泛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致力于国际学术前沿与江苏区域发展案例与经验的结合,试图以更加综合的视角,将近年来经济地理学所发生的多维转向进行学理上的整合,来构建一个融“心智主义”、“制度主义”、“网络主义”等理论于一体,以社会经济活动发生的不同地理尺度为基础,以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嵌入为核心,以文化与经济协同演化为主线的区域发展解释框架。尽管这一理论框架尚有许多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如何定量刻画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及其演化过程尚需要进一步推敲,但作者所表现出的扎实的知识基础、追求学术创新的勇气和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在区域研究中,科学的定量分析和翔实的经验描述都至关重要,而且是两种高度互补的方法。作为具有经济地理学素养的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博士,作者在文化的定量刻画和文化与经济协同的定量分析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同时也在典型经验案例分析方面进行了扎实的田野调查。这种基于案例研究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为认识和解释区域发展的内在过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江苏地域文化多元,南北差异明显,生动的案例分析为“枯燥的”学术分析增添了许多“情趣”,从而使本书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这扇学术大门才刚刚开启。希望召宜能够沿着这个方面,继续探索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术同仁和青年学子,能够加入到开采这一潜藏金矿的行列。

苗长虹

2009年9月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述评 13

第一节 国外研究回顾 13

第二节 国内研究回顾 32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51

小结 61

第二章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理论分析 62

第一节 文化内涵的明晰 62

第二节 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解释 68

第三节 演化经济学与文化经济研究思路的转变 70

第四节 嵌入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综合分析框架的构建 73

第五节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定量研究 105

第六节 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与区域发展模式 112

小结 119

第三章 基于企业与集群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 121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概况 121

第二节 区域文化与板材企业发展 133

第三节 区域文化与板材产业集群发展 171

第四节 基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视角的官湖模式研究 202

小结 217

第四章 县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 219

第一节 县域文化与县域经济的基本内涵 219

第二节 江苏县级行政区划与县域文化 221

第三节 县域文化调查与研究数据基础 225

第四节 江苏县域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229

第五节 江苏县域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264

第六节 基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县域发展模式研究 278

第七节 基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视角的丰县模式与昆山模式比较研究 290

小结 312

第五章 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 314

第一节 区域文化内涵及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的意义 314

第二节 江苏省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 317

第三节 基于文化分区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331

第四节 江苏文化区经济差异形成的文化机理 355

小结 373

第六章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政策措施	375
第一节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	375
第二节 江苏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保障措施	378
小结	395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396
第一节 主要结论	396
第二节 创新之处	401
第三节 不足与展望	404
主要参考文献	407
附录	411
后记	416

导 论

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当前,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学科在知识经济、知识创造、学习创新的背景下对此展开激烈的争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的全面、快速转型,在实践的有力促动下,我国学者在借鉴研究方法、引进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掀起了文化与经济研究热潮。综观这一热潮的出现和持续升温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从国际宏观层次看,主要有四大背景交织互动形成文化经济研究的耦合推力,具体为宏观层次经济差异与差距、全球化、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中文化和制度影响加强的新现实、社会科学中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解释思路的转变^①。

(1) 国家间、大洲间、大区间经济绩效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就全球而言,一直存在着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巨大鸿沟。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言:“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还

^① 参见吕拉昌、魏也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载《经济地理》2005年第4期。

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①面对着国家间的“大分流”^②,李约瑟思考并质问,为什么科学和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李约瑟问题困扰着许多历史学家。马克思—毛泽东学派的历史学家,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归罪于中国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黄仁宇认为,中国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无能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③;韦伯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把中国的停滞归因于儒家传统,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特定文化,特别是新教教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④,形成颇具争议的韦伯命题。20世纪80年代韦伯命题研究重新升温。^⑤同时,冈纳·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价值观与战后现代化理想之间的冲突^⑥,劳伦斯·哈里森发现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并得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的结论。因而,20世纪50年代,奥斯卡·列文将在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反复出现某些共同特性,表达为一种潜在的“贫困文化”,即发展的文化障碍。其后,一些学者继续了20世纪50年代奥斯卡·列文的开拓性工作。^⑦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韦恩·贝克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描绘“全球文化地图”,发现文化观念、

① [美]戴维·S. 兰德斯(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门洪华、安增才、董素华、孙春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②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③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

④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66页。

⑤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第27—125页。

⑥ 参见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谭文木、张卫东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⑦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第100页。

宗教传统和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① 尤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较中发现,具有相似文化特点的东亚地区,近几十年来持续增长,迅速崛起。“东亚奇迹”加强了对文化与经济密切关联的认识^②。可以说,面对国家间、大洲间、大区间经济绩效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众多学者思考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机制在意料之中。因此,宏观经济差异是文化与经济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一背景带有传统性,从这一角度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这一研究的肇始。

(2)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19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社会与空间景观。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凸现。由此,人们开始反思社会发展的模式,并希冀通过发挥文化的作用来抵消种种负面影响。^③ 同时,面对全球化,国家、地方、企业等行为主体,必然进行相应的文化、制度重建,以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发展以地方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和积极的经济管制战略,充分利用地方文化以应对趋同化和防止边缘化^④成为合意并可行的办法。全球化使文化有了全新的内涵与功能,而文化也成为衡量全球化成就的一个标准,即克服有形距离与克服文化距离之间究竟相差多远。对于文化与全球化而言,文化对全球化至关重要,同时全球化对文化也至关重要。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极互动,

① 参见拉尔夫·林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和人格因素》;W. R. 哥尔德夏米德《文化因素与新专门技术的获取之间的相互关系》,刊载于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591—633 页。

② 参见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2—375 页。

③ 参见苗长虹、王兵《文化转向: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载《经济地理》2003 年第 5 期。

④ 参见 A. Deffner Dkaype, *Cul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Volvos: University of Thessaly Press, 2003, p. 470.

构成了时代的文化动脉。^①可以说,正是在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动下,新时期文化研究才得以快速升温。全球化成为“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的催化剂。^②

(3) 新现实与“文化转向”。20世纪70—80年代,全球范围内出现产业大规模衰退,而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 Emilia-Romagna 和 Tuscany、德国的 Baden-wurttemberg、法国的 Oyonnax、瑞典的 Smaland 以及美国的硅谷等“新产业区”由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产生的外部性、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的企业间密切合作”成为战胜衰退的“经济之星”^③。20世纪90年代,格兰诺威特(M. Granovetter)对“嵌入性(Embeddedness)”^④概念的经典阐述之后,经济越来越具有社会根植性、越来越具有历史限定性的研究传统得到了发挥和深化,并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与其削弱经济,还不如通过将其置于其获得意义和方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而将其情景化”^⑤。同时,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知识经济的出现,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以及文化、经济的交织与互动产生的文化经济一体化,使得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这一对某种文化适应的经济(an enculturation of the economic)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都逐渐流行起来。^⑥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

① 参见[英]约翰·汤姆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② 参见苗长虹《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载《人文地理》2004年第4期。

③ Becattini, G.,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Creative Milieu”, In *Industri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G. Benko and M. Dunford, London: Belhaven, 1991, pp. 102-114.

④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pp. 481-510.

⑤ Roger Lee & Jane Wills (eds.),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rnold, 1997, p. xvii.

⑥ 参见 Chris Gibson and Lily Kong, “Cultural Economy: a Critical Review”,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 5(2005), pp. 541-561.

由标准化生产、大众化消费的福特主义向柔性化生产、个性化消费的后福特主义转型。在此背景下,经济组织、社会机构和国家本身都在寻找与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方式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是推动文化经济研究发展的最直接力量,而这些“新现实”引致、促进了“文化转向”,并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落脚点和研究切入点。

(4) 学科发展、理论创新与“文化转向”。经济本身正被看作为一种修辞形式,“新经济”的关键是知识和学习,重视革新、创造、技能培养,特别是意会知识。这些新的理论思潮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学研究发生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① 尤其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复兴,许多众所周知的经济模型现开始强调社会和文化维,特别是,强调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嵌入以及这种嵌入的好处。^② 同时,主要建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地理理论对解释资本主义新时期和新空间中经济转型的复杂地理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促使经济地理学家寻求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从已形成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文献中获得。^③ 全球化、信息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所谓后现代化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的现实,以及经济地理学自身创新的压力和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对“文化研究”的重视,两方面内外互动共同促成了经济地理学向文化的转向。

从国内来看,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对外学术交流中,注重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鉴、理论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化与经济研究的提升。但中国文化与经济的研究更多的是受到中国自身发展中问题出现的影响,或者说,这

-
- ① 参见 Nigel Thrift, “Pandora’s Box?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In Clark, G. L., Feldman, M. P. and Gertler, M. 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9-704.
- ② 参见[英]G. L. 克拉克、[美]M. P. 费尔德曼、[加拿大]M. S. 格特勒等编《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刘卫东、王缉慈、李小建、杜德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版,第 17—33、第 72、第 279—286、第 360 页。
- ③ A. Sayer, *The Dialectic of Culture and Economy*, Lee, R. and Wills, J. (eds.),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rnold, 1997, pp. 27-36.

种研究更多的是我国经济实践的内在强烈需求。就国内而言,文化与经济研究热的出现既与国际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连。

(1) 国内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差距出现并持续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从空间尺度看,既有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东、中、西三大地带问题和近年来引为注目的南北差距,也有中观层次的省域内部差距的拉大问题等。中国经济在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之后,区域差异,尤其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①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经济地域差异巨大,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我国经济地理时空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温州地区、苏南地区以及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文化动力的探寻,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和路径借鉴。同时,通过比较研究,探寻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迟缓的文化阻滞力。^② 一定程度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差距出现并不断扩大,在中国区域文化分异明显的背景下,文化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2) 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快速的、综合的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期。从产业发展来看,工业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文化产业逐步成为支柱产业;^③从制度形态来看,市场将逐步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而一个健康的市场,必须有能够支撑它的道德基础。^④ 历史发展充分表明,历史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

① 参见李小建、乔家君《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载《地理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朱国传《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析淮阴市经济落后的文化地理因素》,载《地理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方伟《文化生产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6 页。

④ 参见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第 92 页。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文化转型,经济结构、经济形态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文化转型,集中表现为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与创生。文化转型将极大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现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并由此形成了促进社会结构变迁的强大动力。^①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由于政策漏洞和法律不完善,出现道德滑坡、社会信任普遍下降,严重的影响了经济健康发展。面对经济成就与文化发展的失调、文化传统与现代经济的不平衡等文化—经济关系的悖论,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的陷阱并觉醒,在正本清源回归古典文明寻求思想源泉和力量的同时,开始文化—经济关系的理论批判与理论建构,实现文化、经济、生态整合的管理创新。^②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冲突及其区域差异逐渐成为人们最关注的话题。正是实践的强烈需求,使得中国学者在借鉴研究方法、引进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问题,掀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与经济研究热潮。

(3) 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21 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发展关键时期,立足新阶段,面对新问题,中国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的发展思想。其中,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既是顺应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和发展大势,也是对文化具有提升城市品位、提高商品附加值、挖掘人的经济品质、增加社会凝聚力等价值整合功能^③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英明抉择。经济文

① 参见孙希有《经济发展的人文向度——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与文化转型》,吉林: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第 131—135 页。

② 参见杨承志《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经济协调发展及其管理创新》,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1),第 1—2 页。

③ 参见漆捷、李英姿《文化在区域经济中的整合功能——以山西区域经济发展为例》,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5 期。

化协调发展将是实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文化良性互动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同时,根据新形势,树立新目标,我国明确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漫长历史进程,其间文化建设尤为重要。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内在要求文化战略的更新和文化价值的重构,并通过科学认识文化与经济互动影响和作用机理为文化战略重构和文化价值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4) 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积极响应。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外向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并在全球化中获得发展的力量。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空洞化的危险和价值链低端化的尴尬。同时,在资本扩张、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信息技术的综合推动下,文化全球化迅速形成。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经济水平向外辐射,形成“非领土扩张”。全球化有其主导文化。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全球化必然是美国化。因此,文化安全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正如我国学者指出:“本来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乃至一种文明要想生存发展就要应对多方面的外来竞争。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经济是民族自强的必由之路。因此探求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机制对于区域和国家繁荣昌盛有深刻的现实意义。”^①文化是一个国家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象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各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激烈碰撞,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

^① 赵荣等编著:《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8、第399—412页。